



华夏文摘增刊
文革博物馆通讯（七三一）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CND）主办 • — • — •

—— 增刊 第八九九期 ——
（二〇一三年六月十七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1306c）

【史海钩沉】	毛泽东发动“文革”为什么要拿吴晗开刀？	鲁 丁
【读史笔记】	殷鉴不远	周家琮
【劫后反思】	良知的拷问（选载之四）	孙怒涛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史海钩沉】

毛泽东发动“文革”为什么要拿吴晗开刀？

• 鲁 丁 •

“文化大革命”骇人听闻，不堪回首。然而，“文化大革命”究竟是怎么搞起来的？毛泽东说：“‘文化大革命’这个火是我放起来的！”林彪1966年10月25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时也指出：“这个运动（指“文化大革命”）从头到尾是主席发动的，主席领导的。”

《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发表，点燃了“文革”的第一把火。针对姚文元文章的出笼，江青曾说：“因为主席允许，我才敢于去组织这篇文章。对外保密，保密了七八个月……”

毛泽东为什么要放“文化大革命”这个火？又怎样放这个火的呢？应该说，这决不是他一时的冲动，而是自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以来，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错误日积月累逐渐发展的必然结果。在毛泽东看来，当时的党中央已经出现了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复辟迫在眉睫，时刻都可能发生，如不发动一场大革命，党就要变质，国家就要变颜色了。毛泽东1966年10月25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时说：“引起警惕，还是二十三条那个时候，北京就是没有办法，中央也没有办法。”在这种认识和估计下，毛泽东就放起“文化大革命”的火来。

点燃“文化大革命”第一把火的是姚文元1965年11月10日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被人们称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引火物”。毛泽东则说：“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应该从1965年冬姚文元同志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开始。”姚文元的这篇文章究竟是怎么出笼的？有的书说是江青组织人写这篇文章的，没有得到毛泽东“批准”。这不符合实际。事后，毛泽东和江青都明明白白向人们讲述过这篇文章的写作过程和出笼情况。另外，还有党的文献可以作为佐证。

1967年9月，毛泽东在会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在谈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从姚文元所写的批《海瑞罢官》的文章“开始”后，接着指出：

那个时候（指1965年初），我们这个国家在某些部门、某些地方被修正主义把持了，真是水泼不进、针插不进。当时我建议江青同志组织一下写文章批判《海瑞罢官》，但就在这个红色城市无能为力，无奈只好到上海去组织。最后文章写好了，我看了三遍，认为基本上可以，让江青同志拿回去发表。我建议再让一些中央领导同志看一下，但江青同志建议：“这文章就这样发表，我看不用叫周恩来同志、康生同志看了。”姚文元的文章发表以后，全国大多数的报纸都登载了，但就是北京不登，后来我建议出小册子，也受到抵制，没有行得通。

江青1967年4月12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也详细地讲过这篇文章的写作过程。她说：

有几年我害病，为了恢复健康，医生要我参加一些文化生活，锻炼听觉和视觉。这样我就比较系统地接触了部分的文学艺术问题。哎呀，觉得这个问题就大啦！在舞台上、银幕上表现出来的东西，大量的的是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东西，或者是被歪曲了的工农兵的形象。……1962年，我同中宣部、文化部的4位正副部长谈话，他们都不听。对于那个“有鬼无害论”，第一篇真正有分量的批评文章，是在上海请柯庆施同志帮助组织的，他是支持我们的。当时在北京可攻不开啊！批判《海瑞罢官》，也是柯庆施同志支持的。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为了这个担了很大的风险啊，还搞了保密。我在革命现代京剧会演以前，作了调查研究，并且参与了艺术实践，感觉到文艺评论也是有问题的。我那儿有一些材料，因为怕主席太累，没有给主席看。有一天，一个同志把吴晗写的《朱元璋传》拿给主席看。我说：别，主席累得很，他不过是要稿费嘛，要名嘛，给他出版，出版以后批评。我还要批评他的《海瑞罢官》哪！当时彭真拼命保护吴晗，主席心里是很清楚的，但就是不明说。因为主席允许，我才敢于去组织这篇文章。对外保密，保密了七八个月，改了不知多少次。春桥同志每来北京一次，就有人探听。有个反革命分子判断说，一定和批判吴晗有关。那是有点关系，但也是搞戏，听录音带，修改音乐。但是却也在暗中藏着评《海瑞罢官》这篇文章。因为一叫他们知道，他们就要扼杀这篇文章了……

我们这里是无产阶级专政，我们自己搞一篇评论文章，他们都不许。气愤不气愤哪！我们组织的文章在上海登了以后，北京居然可以19天不登。后来主席生了气，说出小册子。小册子出来，北京也不给发行。当时我觉得，才怪呢，一个吴晗完全可以拿出来批嘛，有什么关系！

从毛泽东和江青的叙述中可以看出：一、在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问题上，他们两人的意见是一致的。毛泽东说：“我建议江青同志组织一下写文章批判《海瑞罢官》”；江青说：“因为主席允许，我才敢于去组织这篇文章。”有的书说姚文元批《海瑞罢官》文章的策划组织者是江青，不错，但事实表明这“策划组织”是毛泽东建议或允许的。正因为这样，姚文元这篇文章成为他决意发动“文化大革命”总战略中的一步棋，第一步棋。二、彭真“拼命保护吴晗”，北京“水泼不进，针插不进”，《海瑞罢官》的文章在北京“无能为力，无奈只好到上海去组织”，类似的话毛泽东不止一次说过。1966年10月25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去年九、十月份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地方怎么办？我就感到北京我的意见不能实行。为

什么批判吴晗不能在北京发起，而在上海发起呢？因为北京没有人办。”三、江青组织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是秘密的，“保密的”，在政治局委员中除了柯庆施以外，谁都不知道；文章写好后，毛泽东建议“让一些中央领导同志看一下”，江青则说，“不用叫恩来同志、康生同志看了”，“因为一叫他们知道，他们就要扼杀这篇文章”——从江青的说法可以看到：第一，所谓“中央领导同志”，除毛泽东外，既没有排在第一位的中央副主席刘少奇，也没有总书记邓小平。至于彭真、陆定一，那就更不在话下了。尽管从组织程序上讲，他们与这件事有直接关系；第二，所谓“他们扼杀这篇文章”，这个“他们”，当然不是指康生，而主要是指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陆定一等。事实也正是这样。姚文元的文章在上海发表后，受到以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和以陆定一为首的中宣部的抵制，用江青的话说，就是“北京居然可以19天不登。后来主席生了气，说出小册子。小册子出来，北京也不给发行。”这还了得！然而，说不定，这正是毛泽东为发动“文化大革命”所正要造成的一种局面和情势呢！

关于批判《海瑞罢官》，的确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步棋”、“一把火”，这在党的文献中也有明确的表述。经毛泽东审阅和修改过的林彪做的九大报告，在叙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过程这一节中说：“……接着，毛主席又发动了对《海瑞罢官》等大毒草的批判，锋芒所向，直指修正主义集团的巢穴——刘少奇控制下的那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即旧北京市委。”

批判吴晗，矛头指向的是北京市委，是北京市市长彭真及“一大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五一六通知》集中了毛泽东半年多来的所思、所想、所谈，成为“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

有一个问题，或者说一个“谜”，十分值得人们深思。这就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为什么要拿吴晗开刀？只因为吴晗在20世纪60年代初写了《海瑞罢官》，而其“要害是‘罢官’”，即为1959年庐山会议上被罢了官的彭德怀“鸣冤叫屈”，这好像说不大通。这样做，充其量只不过能提高或增强吴晗“问题”的严重性，给他扣上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的帽子；而彭德怀是早已被打倒和下台的人了，翻腾彭德怀的问题，对搞一场“文化大革命”远远不够。毛泽东说“《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尽管当时也云里雾里搞得沸沸扬扬，并且上了中央文件，但说到底也只不过是一个借口和筹码。实际上重要的问题和原因恐怕是因为吴晗是北京市的副市长，“牵一发而动全身”，整吴晗可以作为整北京市委以及中央一些人的入手处。毛泽东本来赞扬姚文元的文章好，好在点了名，但说它没击中要害，即未点“罢官”；后来，即1970年，毛泽东在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时却又说：“关于《海瑞罢官》，那篇文章击中了我们的敌人的要害。”这击中敌人的“要害”又是指什么呢？显然就是姚文元的文章为揭开北京市委以及中央一些人的“问题”架了桥，开了路。1966年第9期《红旗》杂志在《彻底批判前北京市委一些主要负责人的修正主义路线》的社论中说，姚文元评《海瑞罢官》的文章“触怒了前北京市委那帮修正主义老爷们”——用以激怒北京市委，这恐怕是真正的底蕴和天机。

评吴晗《海瑞罢官》的文章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是不是没有吴晗的《海瑞罢官》以及评《海瑞罢官》的文章，“文化大革命”就不要搞了？显然不是。历史的必然性总是通过这样或那样的偶然性表现出来和开辟道路的。实际上，“文化大革命”在毛泽东心中，在长期“左”倾错误所造成的历史情势和局面下，是非搞不可的。

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同陈伯达、胡绳、艾思奇、田家英、关锋等人谈话时指出：

戚本禹的文章（指《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

文章也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史学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庐山会议是讨论工作的，原来打算开半个月，会议快结束了，彭德怀跳了出来。他说：你们在延安骂了我40天的娘，我骂你们20天的娘还不行！他就是要骂娘的。

在1966年3月17日至20日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专门就学术批判问题讲了话，指出：

我们在解放后对知识分子实行包下来的政策，有利也有弊。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吴晗和翦伯赞等人是共产党员，也反共，实际上是国民党。现在许多地方对于这个问题认识还很差，学术批判还没有开展起来。各地都要注意学校、报纸、刊物、出版社掌握在什么人手里，要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进行切实的批判。我们要培养自己的年轻的学术权威，不要怕年轻人犯“王法”，不要扣压他们的稿件。中宣部不要成为农村工作部（按：中央农村工作部被一些人说成“十年来没做一件好事”，于1962年被撤销）。

1966年3月28日至30日，毛泽东同康生单独谈了两次话，然后又同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人谈了一次话，批评“五人小组汇报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指出这个提纲是错误的。毛泽东指出，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他说，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作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去年九月会议，我问各地的同志，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毛泽东要求他们支持“左”派，建立队伍，进行“文化大革命”，并批评彭真、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包庇坏人，压制“左”派，不准革命。他还说如果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书记处于1966年4月9日至12日由邓小平主持召开会议，批判彭真。会议最后作出决定：一、起草一个通知，彻底批判“五人小组汇报提纲”的错误，并撤销这个提纲；二、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经中央审定的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名单是：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刘志坚，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吴冷西、陈亚丁、尹达、张春桥。

1966年4月22日至24日，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他在22日的讲话中说：我不相信只是吴晗的问题。这是触及灵魂的斗争，意识形态的，触及灵魂很广泛。吴晗问题之所以严重，是因为“朝里有人”，中央有，各省、市都有，军队也有。出修正主义，不止文化界出，党、政、军也要出，主要是党、军。真正有代表性的，省、市都要批评一两个。在这次会议上通过了由陈伯达主持起草、经毛泽东反复审改的《通知》修改稿。

1966年4月28日、29日，毛泽东又两次讲话，对彭真和北京市委提出更加严厉的批评。他说：北京市一根针也插不进去，一滴水也泼不进去。彭真要按他的世界观来改造党。事物走向反面，他已经为自己准备了垮台的条件，对他的错误要攻到底！

这表明，毛泽东要打倒彭真以及要把“文化大革命”强加于全党已是箭在弦上、不可挽回了；至于其后接着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只不过是例行一下组织手续而已。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毛泽东仍在外地。会议由刘少奇主持。内容主要是按照毛泽东的意见批判彭真以及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把他们打成“反党集团”，撤销他们在党内外的一切职务。

5月18日，林彪发表有关“政变”的讲话，宣称“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毛主席永远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军共讨之”。并危言耸听地说：“最近有很多鬼事，鬼现象，要引起注意。可能发生反革命政变，要杀人，要篡夺政权，要搞资产阶级复辟。”等等。而这次会议所做的最大的事，恐怕就是它在5月16日通过的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这成为“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这个通知，把毛泽东半年多（即从批判《海瑞罢官》）以来的所思、所想、所谈都集中起来了，反映出来了。其中毛泽东直接加写的两段话，可以说构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实质和基本纲领。

这就是：

“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五一六通知》宣布：“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中共中央于1966年5月28日发出关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的通知。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1966年8月2日中央又决定陶铸兼任顾问）；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组员：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

“文化大革命”的纲领（即《五一六通知》）有了，“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机构（即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也有了，下一步就是怎样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在这方面，毛泽东又接连放了最轰动、最有影响的两把火。

一把火就是批发聂元梓等7人5月25日贴出的《宋硕、陆平、彭珏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是康生通过他的老婆曹轶欧秘密策划的，目的是“在北大点火，往上搞”。大字报攻击北大党委根据北京市委的黑指示在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中，在全国掀起声讨“三家村”的斗争高潮之后，“按兵不动，冷冷清清，死气沉沉”，压制广大师生的强烈革命要求，企图把革命的群众运动纳入“修正主义轨道”。大字报贴出后遭到广大师生的反对，也引起了中央的注意。周恩来派人严厉批评聂元梓违反了中央规定的原则，搞乱了中央的部署。康生大概觉得事情不妙，需要“最高”发话，急忙将这张大字报的底稿（有的说是抄件），背着在京主持工作的常委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送给在外地的毛泽东。毛泽东于6月1日看到这张大字报后，一方面打电话给康生、陈伯达，说要广播，同时又在刊有这张大字报的《红旗》杂志、《光明日报》总编室1966年5月27日印发的《文化革命简报》第13期上批示：

康生、陈伯达同志：此文可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请酌办。

当晚，新华社全文广播这张大字报。第二天，《人民日报》又在头版发表这张大字报，并配

发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一时全国震惊，举世注目。这张大字报像一个火球投入了干柴，引起铺天盖地的燎原大火，烧焦了中国各地一个又一个“反动堡垒”！康生6月2日到北京大学向师生讲演：“大字报一广播，聂元梓解放了，我也解放了！”聂元梓8月2日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华北组会议上说：“毛泽东在全国公布了这张革命的大字报。这天北京大学爆炸了！北京城爆炸了！全国也爆炸了！”周恩来在接见红卫兵时也说：毛主席批发一张大字报，“把全国全发动起来了”。

再一把火就是“热烈支持”清华附中的红卫兵。清华附中是红卫兵的发源地。1966年5月29日，清华附中一批干部子弟建立起名为“红卫兵”的组织。他们除参加社会上批《海瑞罢官》、“三家村”的斗争外，并和学校的所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作斗争。他们以“造反”为旗号，于6月24日、7月4日、7月27日连写三篇“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他们的活动遭到一些人的反对，感到有压力。7月28日，在海淀区的一次文化大革命工作大会上，他们将《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和给毛主席的信，托到会的江青转交毛泽东。毛泽东8月1日就给他们写了一封意义严重而又热情洋溢的信。其中说：

你们在7月28日寄给我的两张大字报及转给我要我回答的信，都收到了。你们在6月24日和7月4日的两张大字报，说明对剥削阶级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申诉，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同时，我对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旗战斗小组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大字报和由彭小蒙同志于7月27日在北京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大会上，代表她们红旗战斗小组所作的很好的革命演说，表示热烈的支持。在这里，我要说，我和我的革命战友，都是采取同样态度的。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还有，我们支持你们，我们又要求你们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对于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们，在指出他们的错误以后，也要给以工作和改正错误重新做人的出路。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就不能最后地得到解放。这个道理，也请同志们予以注意。

毛泽东的这封信一传出，红卫兵组织和红卫兵活动拿到了“尚方宝剑”，一下子风靡全国，震惊世界。诚如毛泽东自己所说：“北京大字报一广播，红卫兵信还没发出，全国红卫兵都动起来了。”此后，毛泽东又接二连三地接见了各地到京的红卫兵。这样，“文化大革命”就被毛泽东一把火又一把火地“点”起来了。

□ 原载人民网文史频道 2012-12-14

~~~~~

# 【读史笔记】

殷鉴不远

• 周家琮 •

不经审视的过去，不被承认的过去，将具有强大力量回到现在，继续如鬼魂般纠缠我们。  
——图图主教

“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周人在《诗经·大雅·荡》里，感慨殷商应以夏桀为历史教训。夏虽迄今尚无信史，但殷商与夏相去何止百年，总结历史教训的古人却不以为远。那么当代的“殷鉴”，三四十年前的文革教训又有多远？以下二则消息给出了完全相反的答案。一则是著名

导演张某，擅于策划盛大庆典和各种“印象”，也许是觉得影响了创作的美好心情，他对今天还有人念兹在兹回忆文革苦难，颇不耐烦地训斥道：文革过去多少年了，还要沉重多久？在张大导演的心目中，文革显然已经十分遥远。另一则消息来自江苏泗洪，去年该地政府把上访者集中起来办“学习班”，以阻止其再次上访。经历过文革的人们都知道，学习班乃文革中限制人身自由，用洗脑、威胁、批斗强行“统一思想”的手段。当时可是有最高指示为其背书：“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很多问题可以在学习班得到解决”。这则消息让我们又觉得，文革闹剧仿佛近在咫尺重现眼前。出此高招的泗洪领导倘生逢其时，文革时少不了成为“活学活用”的模范。学习班在泗洪卷土重来提醒我们：虽然文革已过去多年；虽然对文革记忆的刻意淡忘，使得今天的年轻人对文革的陌生，甚于文革前更久远的年代；虽然文革的血腥动乱，离今天的繁荣太平，也相去甚远；但今日社会的种种乱象，折射出某些官员的观念和行为，离文革其实并不遥远。办学习班、唱红歌与文革的关联，也许不难引起人们的警觉，因为其演出套路，与文革过于“形似”。而与文革未必“形似”、却十分“神似”的事情，其实每天都发生在我们身边。至于当年也有“狗崽子”辛酸经历的大导演表示不耐烦，也不可仅仅视为艺人的轻浮。它毋宁是在警告：文革这段沉重的历史教训，本应作为国家记忆被格外珍视，却正被漫不经心甚至居心叵测地刻意抛弃。好了伤疤忘了疼的导演，代表了不少并不赞成文革、甚至是文革受难者的心态。所映衬出的，是一个今朝有酒今朝醉、浮华短视，对苦难的历史弃之如敝屣的时代。

文革的魅影，几十年挥之不去，并不奇怪。文革动乱的根源，一直没有得到彻底清算。文革蔑视人权，鼓吹阶级斗争和专政的思想旗帜，虽在许多国家陷亿万人民于苦难，业经实践检验已在全球宣告失败，在中国却仍被高举。对人类政治文明先进成果，视为异端坚持“五个不搞”。对载于意识形态盟友，却罔顾国家战略利益慷慨援助。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除了因枭雄已去、家长制难以为继外，和文革时期并无根本区别。“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文革式权力格局，并没有实质改变。一旦执政党又象文革时期犯下严重错误，仍然没有任何社会力量能予以制衡和纠正。党政不分、社会监督和自治缺失，治国之败笔屡见不鲜。有着浓厚皇权色彩、一把手专权和只对上司负责的干部制度，成为官场腐败的深层次根源。项南等锐意改革的官员中箭落马，八十年代“二十八天的未遂政变”，二任总书记非程序去职，已卸任领导人非法干政的事实，均充分证明：党内离谨守程序规则、尊重实行民主，还相去甚远。对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弊病，邓小平早有论述并倡言改革。但三十年过去，此项改革非但连停留在纸面上也没有做到，偶有高官口头述及也被视为异数。本该仅以防务和救灾为职责的国防力量，不经法定程序，（正面的例子是艾森豪威尔动用空降101师维护最高法院裁决）作为处置内政维持统治的最后手段，文革发动者视之为统治基石，也是民主和法治随时可被践踏的重大隐患。对此早已被文明世界所唾弃的制度安排，在后文革时代，却继续主导执政理念并反复强调，而且不乏具体实践。此弊不除，民主法治、长治久安终将沦为空谈。

文革帷幕初落，老一代领导人痛定思痛倡导法治。后文革时代的法治状况，与文革时已有天壤之别。然而类似文革无法无天之事，并没有完全根除，有时还相当严重，每每成为社会的热点痛点。十一届三中全会庄严宣布要永远废止的专案组，仍变相存在。无视法制“从重从快”的运动式严打，记忆犹新。违宪的因言治罪和劳动教养，尽管民间抗议不断却岿然不动。刑讯逼供屡禁不绝、暴力拆迁中的地方政府有组织犯罪、乃至重庆式的“打黑”，无不再现践踏法制的文革幽灵。宪法在文革时不能保护国家主席，今天仍然保护不了遭权力迫害的公民，形同虚设。从民间维权者到公安高官，为免遭迫害都不得不躲进外国使馆。守常先生遁入苏联使馆、革命党人厕身租界、副统帅被迫仓皇出逃、许家屯避祸新大陆，近百年的老故事还不断有新版上演，岂不令人扼腕！法制常遭破坏十分普遍，在特定时空还十分严重，就不再是少数人违法乱纪的偶然现象，而是政治制度法治环境的必然结果。如果坚持把宣称不受任何法律制约的“专政”，奉为治国之基本原则，将执政党的专门委员会，凌驾于无独立可言的司法之上，依法治国就永远是一句空话。

文革发难于思想文化领域，主要武器是“拿起笔做刀枪”的文革式大批判。作为文革最重要的政治遗产，大批判并没有随文革结束而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后文革时代的三十年，文革式大批判几度兴起，虽无疾而终却风声鹤唳。其令人胆寒的政治背景、俨然真理化身的霸道、蛮横粗暴的风格，与文革大批判皆在伯仲之间。从对“异化”理论探索的讨伐到清除精神污染；从批《乡恋》到禁《苦恋》；从批判市场经济到诋毁对外开放；从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到防止和平演变；一直到九十年代后的四份万言书；近年来批民主社会主义批普世价值；继承文革衣钵的批判从未懈怠。文革年代被奉为文艺指南的《讲话》，系七十年来整肃文艺异端的纲领文献，今岁又高调纪念大秀政治姿态。文革时的社论，称之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明灯》，这次竟捧得更高叫得更响奉之为“精神灯塔”。文革大批判未曾止步于批判的武器，武器的批判即人身迫害每每伴随升级。后文革的左派们虽有心无力却也亦步亦趋。意见相左则破口大骂甚至饱以老拳；视为异端除了口诛笔伐继之上演诉讼闹剧；连号称学术刊物的《历史研究》，也载文扬言要对颠覆正统史论者立法制裁。尤为甚者，文革的遗老遗少们，近年已不满足于对文革的暗中眷恋，而是用文革的思维和语言，公然对抗否定文革的历史结论。他们并非仅仅是书生空议论，除了写文章作演讲办网站，还频繁集会、宣传造势，吹捧为他们所推崇、效仿文革的政治模式。为其公开站台或暗送秋波的大小官员，亦大有人在。一时间山雨欲来，大有文革初期大批判开道、与政坛实际角力遥相呼应之势，几近一场复辟文革的预演。

文革对优秀思想文化传统的戕害，还表现为假大空的文革式语言泛滥，公共领域的语言文化严重退化堕落。相声《照相》讽刺的文革色彩丑陋文化现象，并没有随文革结束被抛弃，在官方媒体和文化教育领域，今天仍随处可见。所谓核心价值观不知所云，官员们习惯了空话套话假话，满足于自欺欺人的空洞说教；类似“五道杠”的孩子们从小学会了如何言不由衷；公费订阅的出版物大量生产文字垃圾；努力说些真话的民间媒体屡被整肃；久加诺夫所说的“主旋律”对意识形态的垄断，借助行政手段被强化。尽管大环境腐败不堪，却还号召百姓学雷锋无私奉献。自“五讲四美”始，类似文革“斗私批修”的道德口号，不断被隆重推出，却相继如烟云过眼沦为笑柄。真善美的文明伦理，真本居首。但文革和之前的反右，对民族精神最深重的毒害，是全民说假话，是哈维尔所说的社会生活在虚假之中。文革时的中国，人们纷纷用言不由衷的口号，表示对革命和权力的拥戴。天安门事件发生，朝野军民纷纷声讨。半年之后四人帮垮台，同样的人、在同样的地方、以同样的方式一致拥护。林彪一伙总结道：“谁不说假话，谁就垮台。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口称相信自己不相信的东西”，仍然是今天人们在公开场合的政治姿态。一个社会最深重的危机，也许既非经济衰退和自然灾害，也不是内部动乱或外部争端，而是由文革遗传而来的上述社会精神病态。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留心当下的世态万象，不难发现竟有如此丰富的文革遗产，得到神形兼备的继承。以专项行动专项斗争之名，搞运动仍然是施政执法常态；为貌合神离的所谓意识形态盟友背书埋单，令看不明白战略的外交尴尬难堪；盲目投资和经济过热、大起之后必然带来的大落、一厢情愿的“又好又快”，很难不让人联想到大跃进的“多快好省”；破坏古迹、暴力拆迁，迹近于现代官方版的“破四旧”；如今只出现在落后国度的文革式“打砸抢”，又频频发生；文革中只限针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恶毒攻击罪名，变身为指责县太爷就会被控的诽谤罪；文革时走资派国民党帽子满天飞，如今则动辄大骂汉奸卖国贼；如今的文坛市井，戾气弥漫不输文革年代。“谁要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的红卫兵之骂，升级为2011年“三妈”版，作者仍然来自最高学府北大；真相在深宫幕后扑朔迷离，“谣言”在街头巷尾不胫而走，文革特有的政治景观竟又再现；一度遭唾弃的文革个人崇拜，正跃跃欲试犹抱琵琶半遮面；文革时以妻子侄子辅佐左右，以佞臣仆役为钦差。今日是太子遍布要津，秘书充斥官场；鼓吹血统论的英雄，文革时不过昙花一现。如今有了“还是自己的孩子可靠”家天下的尚方宝剑，真的纷纷荣登高位成了好汉。

文革既非发生在一夜之间，也不会在一夜之间自历史舞台突然消逝。主张“两个凡是”反



对否定文革、抵制平反冤假错案、以反革命罪杀害李九莲等思想犯、再次发起经济上的大跃进、支持学文革搞屠杀的红色高棉，都发生在四人帮已被粉碎、文革宣告结束之后。其时打倒“走资派”、破四旧大串联、停工停课搞武斗的文革乱象虽已停息，然而是否彻底否定文革、还是坚持没有四人帮的文革路线，始终存在曲折反复，有时甚至是十分尖锐的斗争。解放思想运动和清除精神污染，正是这场斗争的表现。无论是思想理论基础，还是政治运动的整人方式和大批判手法，清除精神污染都忠实继承了文革的衣钵，不啻文革的小型再演。从反对市场经济、质疑物权法、扬言让私营经济倾家荡产，到国有经济“理直气壮”的扩张垄断、对民营经济口喊支持实则挤压歧视，无不体现文革仇视私有产权、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顽固和强势。从讥讽特区为租界、反对加入 WTO，到《中国可以说不》、砸汽车烧商铺，让人想起文革火烧英国代办处的狂热。文革虽然已经过去多年，但文革的思想，仍在不断被宣扬；文革的歌曲，还在广泛被传唱；文革的大棒，继续在挥舞；文革的打手，依然官居台上。亲历文革迫害的人们，睹之难免不寒而栗。文革式的“唱红打黑”，令拥戴文革之辈欢欣鼓舞，甚至情不自禁公然号召再来一场文革。他们沿袭希特勒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手法，打着民粹主义的旗帜，利用改革停滞施政失误积累的社会矛盾，欺骗煽动底层民众，许诺再来一场文革，就能惩治腐败，给他们带来平等幸福。一旦发生经济或社会危机，他们就可仿效纳粹、推出枭雄领袖粉墨登场，把百姓和国家再次拖入灾难深渊。然而人算不如天算，适逢换届之际，野心家事发下台，虽属偶然却似显天意。不过倘依照赵启正先生“孤立事件”的口径，仅以刑事个案处理，不揭露文革打砸抢先锋到今日黑打的基因传承，不反思野心家得以升迁的体制和路径，不警惕其思想影响和同党“人还在、心不死”的隐患，不从政治上深刻总结教训，则仍将重复如今各领域治标之政的败笔，文革复辟的隐忧就始终存在。君不见重庆“黑打”硝烟刚散，贵阳小河案又起纷扰。薄熙来虽然身败名裂，韩德强打人仍然理直气壮。

日本右翼今天蠢蠢欲动，而且在国内不乏支持者。其根源在于，战后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清算很不彻底，日本朝野对侵略的罪行和根源，一直缺乏深刻的反省。如果我们对文革的思想和制度根源，不能深刻反思、彻底清算，对文革复辟的风险麻木不仁。陶醉于有宪法无宪政，有代表无代议，有选举但内定结果式的所谓特色民主；坚持口头讲法治却视法律为工具的专政原则；拒绝政治决策和运作的公开透明，政府新闻办炮制“休假式治疗”的笑柄，“谣言”每每变身比戏剧更精彩的新闻；排斥外部和舆论监督腐败不断蔓延；高喊经济转型却言行不一因循拖延；坚守培养“听话出活”驯服工具的教育，却终日侈言创新；面临改革的历史抉择一味拖延、回避。“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矣”的历史悲剧，将不可避免再度上演。总理在感叹“知我罪我，其惟春秋”时的告诫，也就绝非空穴来风和危言耸听：“文革的错误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在貌似治平之世的今天，行将辞任的总理，发出文革或将复辟、亟待曲突徙薪之警言，是否杞人忧天？苏轼在《晁错论》里的警告，也许早已给出了回答：“天下之患，最不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于不可救。起而强为之，则天下狙于治平之安而不吾信。”忧国忠言的晁错，不为汉景帝所信惨遭腰斩；千年之后直言忠谏的苏轼，还是不容于当朝被贬官放逐；又过了近千年，说真话的先知顾准，仍旧落得家破人亡。中国历史再也不发生这类悲剧的日子，离我们究竟还有多远？

壬辰仲秋于有竹斋

□ 原载《良知的拷问》（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 2013 年 2 月第一版

~~~~~

【劫后反思】

良知的拷问（选载之四）

• 孙怒涛 •

〔上接 z k 1 3 0 6 a 第五章 “井冈山”一统清华错误不断(1 9 6 6 . 1 0 — 1 9 6 7 . 4)〕

第七节 江青接见，第一印象居然是她很有气质

1 2 月 3 0 日下午，蒯大富把一部分总部委员召集在一起，说是有中央首长要接见我们。是谁，他没说，有点神秘兮兮的样子。我们跟着他到了静斋。他敲门，门开了。蒯大富、刘才堂等在前面（那天鲍长康外出不在校），我比较靠后，我们依次鱼贯而入。

有一位首长站在门内，与我们一一握手。我一看，不是别人，正是“文化大革命的旗手”江青！

我感到很惊奇，有点意外。怎么？江青到清华来啦？但是，并没有太大的激动或兴奋。

这是我第一次、而且是那么近距离的见到江青。

她显得比较高挑，腰板挺直，身材修长，戴着黑边眼镜，给人的感觉很有气质。

江青和王光美，都是中国的第一夫人。在我第一次见到她们的时候，她们都还是高高在上为人仰视的大人物。

我说一句老实话，这两个人当时给我的第一印象，江青的气质与形象远胜于王光美。

多年后，偶尔有友人问起我对江青的印象，别人会惊奇地叫起来：“你有没有搞错哦？江青这女人还有气质？”

凡是经历过文革年代的人，都有资格对江青评头论足一番的。她心胸狭窄、心肠歹毒、祸国殃民，这样的女人还能说得上有什么气质？

应该承认，像我这样一个从农村里走出来的土包子，在那个时候并不真正懂得什么叫气质，可能是感觉她长得很有精神，形象不错之类的印象罢了。

文革之初，江青在北大的大操场有一个长篇讲话。我看的是大字报，没有听录音讲话。她在讲话中谈到她家里发生的一些事情，并上纲到阶级斗争的高度。当时我就想，家务琐事，家长里短的，值得在北大这样的万人集会上来渲染吗？难道这也算是阶级斗争？这不是将阶级斗争庸俗化吗？我很不以为然。

在这次见到她之前，除了这一点以外，其他的，我对她并没有什么不好的印象。因为是毛主席的夫人，因此爱屋及乌。还因为党的报纸上广播里都在吹捧她，我也深信不疑。

后来，随着文革的进展，江青对团派的偏袒和对蒯大富的宠爱让我感到不满。江青指手画脚、颐指气使的模样也让我厌恶。于是我对江青的好感慢慢消失。再后来，她那种表演一样的惺惺作态让我恶心。她竭力鼓吹“文攻武卫”的口号让我非常反感。周恩来对她过分的“谦恭”她居然安之若素，这让我愤而不平。以至于后来一听到她在群众大会上的讲话，那尖锐的嗓音，尤其是带着颤音的“同～志～们～好～”能让我浑身起鸡皮疙瘩。到那个时候，曾经有过的认为她很有气质的那点印象，早就没踪没影了。

那天的江青，她的身份不仅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副组长，更是毛主席的夫人，是无产阶级司令部中最值得信赖的人之一，我们对她只有毕恭毕敬的份儿。

我们坐下以后，就正襟危坐着聆听她的教诲。除了蒯大富有资格有时候简短应答以外，我们其他的几个人个个都像小学生见到老师那样，洗耳恭听，点头颌首，能发几声嗯嗯哦哦的回应已算斗胆的了。

因为就那么十几个人的范围，所以江青说话也就用不着提高分贝了。她说话字正腔圆，听起来还是很悦耳的。至于她具体讲了点什么，早已忘记了。

陪同江青一起来的还有王力、关锋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江青来清华视察并接见蒯大富和总部委员，接着又在西大操场与全校师生见了面、讲了话，这件事传递给我一个强烈信息就是：中央文革是信任蒯大富的，是支持“井冈山兵团”的！

后来，尽管对江青有多少不满，也只是在心里想想而已，根本没有要反她的念头。曾经与极个别最可靠的朋友私下议论过江青，哪敢随便跟其他人瞎说哦。

江青前脚刚走，王光美后脚就到。当然，这一次王光美不是来视察清华的，也不是作为贵宾请来的。她是被蒯大富“智擒”来批斗的。

第八节 反感使诈擒拿王光美，开始在观念上与总部有隔阂

“井冈山兵团”成立后的第一个大动作就是发起 1 2。2 5 大行动。六千多名清华师生第一次把打倒刘少奇的标语口号从校园里推到街头、推向社会。

文化大革命最主要的斗争目标就是要揪出刘少奇这个混入党内的赫鲁晓夫，这在当时已经是一个路人皆知的公开秘密了。这是斗争的大方向。我支持总部的决议，也积极参加了这次大行动。

“井冈山兵团”成立后的第二个大动作是此后十几天即 1 9 6 7 年 1 月 6 日发生的“智擒王光美”。

王光美名为清华工作组的成员，实为幕后指挥者。而她的背后就是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工作组在清华犯下极其严重的错误，王光美的责任是第一位的。清华师生要求王光美回清华做深刻检查，这要求合情合理，无可厚非。

周恩来曾在几天前表过态：要王光美做书面检查可以，但是不同意揪王光美回清华。这个态度也是毛泽东的态度。但是，蒯大富并不甘心。嘴上不敢强顶，心在暗暗盘算。正在这时，电机系的“捉鬼队”策划了一个捉拿王光美的秘密行动方案，蒯大富点头认可了这一鬼主意。

刘少奇、王光美的女儿刘平平在北师大一附中读书。“捉鬼队”想法先控制了刘平平和同校读书的妹妹刘婷婷。然后以公安局的名义给王光美打电话，说刘平平在回家路上出了车祸，正在北京第二医院救治，要他们赶快来医院探视。又假冒医院的医生给王光美打电话，还让刘婷婷在旁说了句“妈妈，姐姐受伤了”。接到这样的车祸电话，爱女心切、纵然是白区工作经验极为丰富的刘少奇也一时慌了手脚，未及多想，急匆匆与夫人一起赶往医院。他们根本就想不到居然会有人敢胆大妄为把骗局设到他们头上。

本来只是想把王光美骗出中南海，没想到连刘少奇也一起被骗出来了。这大大出乎于这出闹剧策划者的预先设想。他们没敢动刘少奇，只把王光美揪了回来。

蒯大富对能否揪回王光美并不抱多大希望，所以他根本就没有做批斗王光美的准备。那天晚上，我们总部委员二十多人正在静斋开会。八点多钟，大喇叭突然广播说清华园第一号大扒手王光美被揪回来了，要全校师生员工赶快到西大操场参加批斗会。我听了很惊讶。看蒯大富的神色，很惊喜。他立即宣布休会。我跑到西大操场，登上主席台，只见群众纷纷赶来，秩序很乱。不一会，由总部委员任传仲主持审问批斗王光美。因为没想到王光美竟然这样容易就被骗到了手，怎么审，怎么斗，都是现场临时发挥的。倒是王光美，大概早就料到会有这么一天，对所审问题应对自如，挑不出毛病。有时她的狡辩、回驳和诘问反把审问者弄得张口结舌、无言对答。本来是被工作组迫害的有理一方，竟然比迫害师生的无理一方还显得尴尬。台下群众又是气愤又是着急。大会只能喊喊口号以壮气势，然后就急忙宣布散会。对这样一个匆匆召来、草草收场的批斗王光美大会，到场的绝大多数师生员工感到失望和不满。

运动就是一切，结果是次要的。能把王光美骗出中南海拉到清华做检查，对“井冈山兵团”来说，已经是一次伟大的胜利。更何况，骗斗王光美的过程是那么的“精彩”刺激。《井冈山报》不惜篇幅，以《智擒王光美》为题，绘声绘色地大肆传扬。因为这件事发生在清华，发生在王光美身上，全国各地很快都知晓了清华“井冈山兵团”斗了王光美。

蒯大富看到昔日风光无限的王光美成了他的阶下囚，内心一定是扬眉吐气的。于公，这是对刘邓反动路线的一次沉重打击。于私，也算是出了一口恶气，报了一箭之仇。这样一种为公为私的情绪，我能理解。我心里也一样的解气，只是为没有打掉王光美的嚣张气焰而遗憾、而不满。

我当时只看到王光美被揪回来了，大快人心，并不知道揪她的过程。后来才知道，所谓“智擒”，原来是使计诈骗。

当我知道周恩来明令在先，说毛主席不同意王光美回清华检查，蒯大富竟然置周恩来传达的最高指示而不顾，用这样不正当的手段来“智擒”王光美，事后还大肆宣扬，毫无认错表示。这让我感到很震惊。

第二天，周恩来在一次谈话中，严厉批评了清华“井冈山兵团”的1.6行动。他说：“这是一场什么戏呀！恶作剧啊，不正常。骗去斗，还是斗了。现在不是揪斗了，而是骗斗了。这是不正常的，共产党不这样。……这种作风就是彭、罗、陆、杨的坏作风，就是背后捣鬼，不是堂堂正正的政治斗争。”我在事后看到这一严厉的批评，非常赞同！

但是，对于周恩来这样很严肃的不寻常的批评，总部里多数委员并不以为然，没有认真的反省和检讨。无论在底下还是在会上，他们的观点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只要是革命的需要，为了达到革命的目的，可以不择一切手段。越是简单、越是直接、越是有效、越是一击中的的手段，就是最好的，都是可以使用的。谁要是去考虑这种手段是高尚还是卑鄙，那就是不懂得阶级斗争的残酷与复杂，就是一个糊涂虫。

我对于这样的观点，从内心就有一种格格不入的排斥感。我总觉得，目的固然重要，达到目的的手段、方法也是同样重要的。要是用残忍的、卑鄙的、阴谋的手段追求崇高的、伟大的、正义的革命目的，那么这个目的是否真的革命、真的崇高、真的伟大、真的正义，就是很值得怀疑的了。

在你死我活、你亡我存的军事斗争中，当然是要兵不厌诈，不能书生气十足的。但是，我认为我们与王光美之间，那是路线斗争，是政治斗争，还不是敌我性质的矛盾，怎么可以用这样欺诈的不光明的手段去达到“革命”的目的呢？即使性质是敌我矛盾了，要是对方已经成了阶下囚了、失去抵抗能力了，也是要讲政策，不能为所欲为的。难道只要冠以革命的名义，就可以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了吗？

我很明白我这种想法是妇人之见，是政治上的幼稚可笑，是宋襄公蠢猪式的愚蠢，但是我的内心就是无法接受“为了革命目的而可以不择手段”的观念。要那样，我就必须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改造得不再是我自己才行。

王光美在清华犯下了严重的错误，甚至是罪行，要她回清华做检查，接受全校师生的批判和声讨，这个要求是完全合理的、正当的、革命的。要是我处于蒯大富的位置，我会不断地向中央反映清华师生强烈的革命要求。能不能揪回来，取决于中央的全局考虑。如果中央不同意，我会向大家作解释，也会再次向中央要求。我肯定不会采取与中央意见相左的行动，更不会采用这种不光明磊落的手段去“智擒”。

我当时想，蒯大富敢于按照非常理出牌，于是他成了红卫兵领袖。我比较循规蹈矩，不会也不敢这样做，所以我最多只能成为他的一个下属。

几个月来，我一直追随蒯大富。因为我认为他的政治方向是正确的。他在政治上的敏锐、果敢、勇气等等都是我所佩服的。即使发生了“智擒王光美”这件事，我觉得在政治观点方面我与他并没有什么矛盾。但是，我隐隐约约感觉到我与他之间好像在政治观念上有矛盾，在为人处世上存在差距。

与战友、与伙伴、与朋友，不可能做到各方面完全一致的。与蒯大富存在着一点差距并不影响我继续跟着蒯大富与他一起并肩战斗。只不过，从这个时候开始，我不再无条件地、全方面地向蒯大富靠拢了。我心里多了一份警觉。我有意识地与他保持了观念上的距离，我要守住我最底层的观念。

许多人只知道我在整风与干部问题上开始与总部有分歧、与蒯大富闹矛盾的。其实，观念层面上的分歧是从“智擒王光美”这件事以后就开始了。

事情总是一步步发展的，过程总是一页页展开的。几乎是与“智擒王光美”这一事件同时，蒯大富开始反唐（伟）、反“八八”，我与蒯大富之间的分歧就显现在政治观点这层面上了。

第九节 不赞同反唐（伟）反“八八”，开始在观点上与总部有分歧

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之下，三总部联合了。但是，组织上虽然联合成“井冈山兵团”了，政治上的分歧、思想上的隔阂还是很大。联合前的各自整风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些分歧和隔阂。

唐伟对兵团总部有批评的权利，这应该得到尊重。但对他的自动辞职，我认为是一种轻率的、不利大局的、带有“分裂”倾向的行为，我心里对此很不认同。不过，我并没有对唐伟进行公开谴责。

“28团”就不同了，他们立即对唐伟进行反击。他们认为“唐伟等人反总部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的代言人，是陶铸在清华大学的代言人，是反动路线新的反扑”。曾同是“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头头现为总部委员的刘泉更认为“唐伟是机会主义者、是叛徒、是资产阶级反动路

线的代言人，想煽动群众分裂，整垮“井冈山”总部……在我校，对待“井冈山”兵团的态度就是真革命、假革命和反革命的分水岭”。蒯大富发表声明，认为“托派分子在趁机夺权”。

对唐伟进行批评，是可以的，也是应该的，因为我也认为唐伟是有错的。但是，那样的高调和尖锐已经不是善意的批评，而是恶意的攻击了，这又是我不能同意的。

“28团”也好，蒯大富也好，他们要打压唐伟否定“八八”有他们的理由。因为早在“八八”、“八九”对立的时候，蒯大富他们就对“八八”的软弱，对“八八”不敢为蒯派公开平反表示不满。那时种下的不满种子，现在开始发芽、发酵了。

令人惊奇的是，曾经是唐伟“亲密战友”的陈育延，在反唐、反“八八”中扮演了急先锋的角色。是她最早贴出“《唐伟同志在个人主义的泥坑中是不会有作为的》大字报，揭开了全校反唐战的序幕。”此后她坚定支持蒯大富和“28团”的立场，接连发表《彻底批判“八八”的改良主义、投降主义路线》、《从“八八”的成立看它的反动目的》等大字报，对“八八”全盘否定。看着陈育延的表演，我大跌眼镜！太不理解了！

对于陈育延为什么要如此作为，我是“局外人”，一直没想明白。连作为当事人的唐伟，在这个问题也想了几十年！

不管蒯大富、陈育延反唐伟的内幕怎么样，事实是，由陈育延带头否定“八八”，“八八”最受伤（我也是其中一个受伤的小兵）。由陈育延带头反唐伟，唐伟心最疼（我设身处地猜想的）。

在“八八”时期，陈育延和唐伟一样，也是非常有威信的领导人。她鲜明的观点、善辩的言词和爽直的个性，都在我们这些“八八”基层群众中留下深刻的良好的印象。

几个月之后，唐伟稍稍向右转，陈育延急剧向左转，两个人就这样分道扬镳、各奔东西了。唐伟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大不如前，陈育延在我心目中的形象更是直线下降。两位我曾经很钦佩的“八八”带头人，几个月以后竟会变成这样，令我唏嘘不已！

在“井冈山红卫兵”还没有成立的时候，是“八八”与“八九”在进行艰苦顽强的斗争。我是持“八八”观点的，也参加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所以我对“八八”是很有感情的。当然，我对它后来表现出来的软弱性和斗争不力也有不满。这也成为我参加“井冈山红卫兵”的原由之一。即便如此，“八八”的历史功绩是客观存在，不能否定的。唐伟作为“八八”的最主要的头头，更不应该被当作托派来攻击的。

面对总部的反唐、反“八八”，“三纵队”毫不示弱，针锋相对。借着总部整风的机会，反击的调门也越来越高。与唐伟一起辞职的“总部委员”朱德明说：“蒯大富这个人不能洗温水澡，对蒯大富得用100℃开水烫！”。这样极端说法的大字报，我亲见过。当然，这也是极个别的。兵团总部与“三纵队”口诛笔伐、恶言相加，谁也没有好听的话儿。

那是一个唯我独革（命）、唯我独左（派）的年代。所谓整风，自己的错误尽量回避，回避不过去就轻描淡写地说几句。别人的错误就使劲儿整，上纲上线的整，很难做到心平气和、实事求是的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

在“28团”与“三纵队”刚发生内战的时候，“天安门纵队”基本保持沉默，没有表态。后来，虽然我觉得两边都有错都该打板子，虽然我在大的政治观点方面基本上是站在蒯大富这边的，而且我觉得唐伟有错在先，但是我还是认为，在兵团总部与唐伟、与“三纵队”的矛盾

纷争上，总部是要负主要责任的。因为现在“井冈山兵团”已经掌了清华的大权，运动的主导权在总部这一边，矛盾的主要方面也在总部一边。是总部把兵团内部矛盾的性质搞错了。

我心里想，蒯大富你刚被工作组整过，掌权才几天，你为什么马上要去整别人呢？这别人不是敌人，是曾经的战友呀！工作组撤下斗黑帮的大方向不顾而斗蒯派是方向性错误，你现在放下斗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方向不顾而反唐伟、否定“八八”，那不是也在犯着与工作组一样性质的方向性错误吗？

我心里虽然觉得蒯大富反唐、反“八八”是错误的，无论从道理上还是从情感上，我都通不过。但是要我站在“三纵队”一边对蒯大富公开谴责，我同样也做不到。两边都有一些极端的言论，我都很反感。我不支持、不参与对唐伟的“围剿”，我也不支持、不参与“三纵队”对总部的反“围剿”。对于这场兵团内部的窝里斗，我看着，除了痛心，还是痛心。

在1月中旬，当时社会上有一股“经济主义妖风”。为响应中央号召，清华“大批革命师生去车站、工厂、外地宣传抓革命促生产。……四大纵队派的同学大部分离校，杀向各地反击经济主义黑风。”我也带着“天安门纵队”的部分战斗组去了太原。因为校内留有人，对学校里的形势还是比较了解的。到1月底，学校内斗又起。我打电报给蒯大富，明确表示我反对反唐，反对否定“八八”。同行的王允方等人认为仅仅打个电报表个态效果不大。我觉得有理，于是只身一人赶回学校，当面劝说蒯大富别继续这样干，敦促总部诚心诚意地开门整风。蒯大富正在兴头上，哪里听得进我的谏言？在总部与“三纵队”的矛盾上，我感觉我左右为难、深浅不是。

“天安门纵队”的好些战斗组后来的态度比我要明朗得多，他们没有我那么多的顾虑。他们的基本倾向是站在“三纵队”的立场上批评总部，只是在批评的态度上，比“三纵队”要和缓一点，没那么尖锐。我记得汲鹏曾经对我说过一句印象深刻的话，他说：“老蒯今天否定这个，明天否定那个，这样下去最终会否定了老蒯自己。”

到2月初，蒯大富才意识到反唐、反托、反“八八”搞不下去了，这场闹剧戛然而止。

这当然与“三纵队”的坚决抵制有关，与兵团里为数众多的中间群众对此不满有关，更重要的是，中央文革来干预了。中央文革办公室的阎长贵给兵团总部打来电话：“我前几天来你校看了一下大字报，发现了你们反‘托派’，这是不对的，不应该把矛头指向群众，而应当指向当权派，一般同学有错误缺点应当批评帮助，反托派对本身不好，对团结也不好，请转告蒯大富”。蒯大富对中央文革的指示还是言听计从，不敢顶风的。历时一个多月的反唐、反“八八”就此刹车了。蒯大富在大会上表态说：“反托反唐错了，客观效果是不好的，但主观并没有把矛头指向群众的意思”。

蒯大富在“井冈山兵团”成立前的表现一直是可圈可点，应当基本肯定的。在被工作组迫害的时候，他的勇气是非凡的，他的反抗精神值得大书特书。翻身了，掌权了，成了多数派了，成了“执政派”了，全国扬名了，掌声四起了，被中央首长青睐了，年轻的蒯大富随着他的政治地位从地狱火箭般地窜到天堂的变化，他的思想也在悄悄地快速地起变化。蒯大富没有在工作组的大棒下打垮、压倒，现在，在掌声和吹捧声中，蒯大富已经有点飘飘然、昏昏然、不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不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了。犯了错误，他避重就轻、文过饰非，已经没有正视问题、承认错误的勇气。我认为，蒯大富以后所犯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的错误，就是从反唐、反“八八”开始的。此后，蒯大富的所作所为乏善可陈，留下的是斑斑劣迹。

我非常为老蒯惋惜！

很长时间我一直想不明白，为什么蒯大富一掌了权马上就要反唐、反“八八”。过了好多年，知道了斯大林一上台也是把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一个个搞掉的。毛泽东一建国也是把高岗、彭德怀、刘少奇一个个搞掉的。同样的体制，同样的理论，同样的路线，会做同样的事情。这样一想，蒯大富这样做就毫不奇怪了。手握大权以后，以敌对阶级以代言人、代理人的罪名，清除异己，消灭盟友，建立极权专制，都是一样的行径。当然，差别在于蒯大富无法与这些历史巨人相并提。在毛泽东的眼里，他只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小卒子。

历史上“井冈山红卫兵”与“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之间的“旧怨”没有化解，现今团派（兵团总部）与“三纵队”之间又添了“新仇”。唐伟不满蒯大富就辞职并组织纵队，蒯大富向唐伟、“八八”开刀打击“三纵队”，造反派内部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分裂，团四两派的雏形已经形成。只是，这个时候所争夺的权，是对清华文革运动的主导权，是大字报大喇叭的话语权，是对中间群众的引导权，是一种“虚权”。而到围绕筹建清华革委会而展开的权力之争，则是在争实实在在的“实权”了。

从蒯大富翻身（以10月6日蒯大富在十万人大会上宣读誓词为标志）才三个月，从蒯大富掌权（以12月19日成立“井冈山兵团”为标志）不到一个月，蒯大富就在如何正确对待无产阶级司令部（主要体现在“智擒王光美”和对周恩来的批评上）、如何正确对待持不同观点的战友（主要体现在对唐伟对“八八”的态度上）、如何正确对待自己（例如，已经开始造“以蒯大富为首的正确领导下”、“响应蒯大富的号召”之类的舆论）等问题上开始犯错误。“三纵队”对此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我在总部内部，后来也在公开的场合表示了与总部不同的观点。我在观点上开始与总部有比较大的分歧了。但是我的态度还是比较和缓的。我认为这是革命小将经验不足，是前进中的错误。我认为“三纵队”过于尖锐的批评或指责不利于蒯大富改正错误。从情感上说，我与蒯大富还是要更近一些。只是，亲近的距离在慢慢地拉大。随着干部问题上大辩论的展开，我与蒯大富之间的关系，就由亲近而转变成疏远了。

第十节 干部问题上的大辩论，我与总部尖锐对立

有着近两万名师员工的偌大清华，大致可以分为五个群体。

文革中，人数最多、热情最高、能量最大、冲劲最足的，首推学生。文革初期，学生是清华文革的主力军，也是高校和全国文革的先锋队。

另一个群体是教师。教师的年龄跨度很大。年龄大一些，就显得稳重或保守些。青年教师，则显得相当活跃，但是活跃度远不如学生，因为教师已经是社会人，与学生的身份不同。他们经历多，顾虑也多。

还有工人群众，集中在后勤、车间、实验室等地方。由于人数相对较少，写大字报和辩论的能力较弱，在知识分子成堆的清华园里，影响力有限。

研究生是一个比较小的群体，介乎于高班学生与青年教师之间。人数虽不多，却具有相当大的能量和水平。工化系的“不怕鬼”、土建系的“揪要害”都是闻名全校的战斗组。

最后一个极其重要的群体，就是干部。

清华的干部队伍，按级别可分上层、中层、基层三部分。

上层干部是党委正副书记，才几个人。中层干部是指学校部、级处级和系这一级的党政主

要领导干部。校级科室及系教研组这一级的都属于基层干部。

从1966年6月9日得知蒋南翔被停职反省、工作组进校开始，干部队伍就受到了群众运动的极大冲击。甚至有不少与学生接触最频繁最密切的辅导员，也有被学生游街、批斗、殴打、戴高帽子。按说，辅导员算不上是真正意义的干部。

工作组进校五十天所做的两件大事，除了反崩就是整干部。

一进校，工作组先把干部统统赶上楼。这不稀奇，是工作组的传统做法。

从6月24日反崩开始到7月18日紧急刹车，反崩成了工作组的第一要务。这段时间工作组已经忙得顾不上大整干部了。客观上，崩派们替干部们挡了不少拳脚，让他们稍稍喘了一口气。

反崩紧急刹车，又开始斗黑帮整干部。不过才十天左右时间，工作组就滚蛋了。

工作组撤走以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集中在批判它对学生的镇压上，为革命造反精神平反。

经过几个月文化大革命急风暴雨般的洗礼，干部们已从最初的惊恐迷茫中缓过神来。对大多数基层干部的冲击本来就不算太厉害，他们事实上已经自己解放了自己，群众不再与他们为难。

虽然中层干部也在努力争取自我解放，纷纷要求与红卫兵小将在一起，在战斗中得到新生。但是他们还没有得到群众的谅解，没有得到“解放”。上层干部个个都是黑乎乎的黑帮身份。

早在1966年的10月中旬，就有“揪要害”战斗组贴了大字报，认为一下子把大批干部打成黑帮是错误的。此后，又写了《再谈是谁把大批干部打成黑帮的》、《解放黑帮》等大字报以及《你知道我校有多少“黑帮”吗？》的调查报告。

老实说，我的思想没有那么敏锐。对于干部问题，在那个时候我一点意识都没有。

这以后，陆续有不少大字报谈干部问题，但是没引起大家更多的关注。因为那时的焦点在大联合、整风以及此后的反唐反“八八”的争论上。

等到反唐反“八八”告一段落，等到外地省市有的已经成立“三结合”的红色政权（革委会），学校运动的中心开始转到干部问题上来。

1967年2月22日，《红旗》杂志第四期发表了《必须正确对待干部》的社论。这篇社论对全校师生的震动较大，它正式把运动重点引向干部问题。

工作组撤走以后，学校的权力处于真空状态，运动也处于无组织领导的状态。每个人思考、判断、决定的主要依据来自下面几个方面：一是毛泽东的最新指示以及中央文件。这被认为是最权威的，不容怀疑必须紧跟的。二是两报一刊社论。这也被认为是代表了无产阶级司令部声音的。三是中央首长讲话。因为各个中央首长讲话的调子并不完全相同，譬如周恩来的讲话与中央文革的讲话有较大的差异。即使同为中央文革的成员，讲话的分寸、轻重上都有点不同。再加上已经有今天在台上大紫大红明天就被打翻在地的先例（如陶铸），所以每个人对中央首长的讲话，基本上都是采用实用主义的态度对待之。合我心意者就听之，拥护之，不合我心意者

就忽略之，甚至反对之。

《红旗》这篇社论之所以会产生那么很大的反响，是因为它提出了一个合民心合时宜的大问题。

以红卫兵为标志的青年学生在文革初期表现出敢冲敢打的精神，起了先锋的作用。但是要建立新的权力机构，仅仅只有红卫兵小将是不行的。在未来的新政权中，革命干部是不可或缺的。

于是，解放干部，即解放那些在运动初期被冲击现在已经有了认识有了觉悟的干部，让他们从运动的对象转变成为运动的动力，并为以后结合进领导班子做准备，是这阶段的重要任务。

要解放干部，首先必须要正确地分析干部队伍。而这，又离不开对文革前十七年教育战线基本形势的估计。

毛泽东认为在教育战线上，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占着统治地位。所以，要批判刘少奇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就必然会涉及到如何对干部在这十七年来的表现、定性的问题。这是一个统称为“十七年”的问题。

而要批判刘少奇这五十天里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又必然会涉及到对干部打击一大片这个严重后果。这是一个统称为“五十天”的问题。

围绕着这些问题，各个战斗组、各个纵队等战斗团体、各个知名的有影响的人物都用大字报或者集会演讲等形式来阐述各自的观点。各层干部们对于关乎自己的政治生命和今后前途命运的干部问题更是格外的关注。

中层干部纷纷出来亮相，表示要永远跟着毛主席干革命。

连刘冰这样的上层干部也贴出《热烈欢呼〈红旗〉第四期社论发表，永远跟着毛主席革命到底》的大字报。他说根据自己知道的情况，还不能做出蒋南翔是阶级敌人的结论。这样的表态当然引来一大批大字报的强烈批判。

对学校原校级领导及中层干部的亮相，许多战斗组都纷纷表示了自己的观点，并且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正在争论得不可开交的时候，3月31日，《红旗》杂志发表了评论员文章《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批判》和调查员文章《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九六六年六、七两月清华大学工作组在干部问题上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情况调查）》。这调查员文章是毛泽东亲自修改过才发表的。

这篇以清华大学为典型素材的调查报告，犹如一枚重磅炸弹投落在清华的上空，造成了一次更大的冲击波。

尤其是因为这篇调查报告是伟大领袖亲自修改批准刊登的，清华园里的欢呼声更是高过以往。

虽然兵团总部专门成立了一个由总部委员陈继芳负责的“二办”（干部办公室）来处理干部

的问题，对不少亮相的干部也表示了积极的支持。但是，总体上，兵团总部对《红旗》第四期社论发表后的形势跟得不紧，贯彻得不力。

要说，兵团总部对打倒刘少奇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向来是很积极，跟得很紧的。12。25大行动和1。6揪王光美都是明证。对这篇作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利器的《红旗》调查员报告，它也应该是热烈欢呼、坚决拥护、认真贯彻才合情理。

可是，令人惊奇的是，由“28团”中的一些战斗组写了一篇《〈红旗〉杂志调查员文章欺骗毛主席罪责难逃》的大字报，认为“游街一大串是革命的群众运动，好得很！……《红旗》调查员的文章和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唱反调，丑化了革命群众运动。”

这篇大字报同样具有爆炸性。因为它不仅宣称游街一大串好得很，而且公然与毛泽东钦定的《红旗》杂志调查报告唱反调。这不是公开地与中央的指示唱对台戏又是什么？

尽管总部立即发表声明，宣称《罪责难逃》这张大字报是根本错误的。尽管相当多的团派战斗组和团派群众并不同意这张大字报的观点或者有所保留。但是因为写这张大字报的战斗组都是属于团派的骨干战斗组，总部无法与它撇清关系。事实上，依我看来，《罪责难逃》这张大字报所表达的正是相当一部分团派骨干真实的内心思想。以造反有理起家的蒯派，热衷于过激的革命行动，对否定“游街一大串是革命的群众运动”的言论，他们有一种本能的不满和抵触。

围绕着关于干部问题的大论战（这论战从1967年年初开始，在三四月份达到高潮，以后以不同的形态一直持续到1968年下半年的七二七），两种观点的分歧慢慢变得清晰起来。随之，团派与纵队派这两大阵营在论战中自然形成。

团派从毛泽东的许多语录中找到答案，认为十七年的教育路线是修正主义的，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广大的干部都是执行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所以，对这十七年必须要来一个大翻个儿！对旧清华必须彻底砸烂。这就是“彻底砸烂”论的主要论点。

纵队派同样也从毛泽东的不少教导中找到答案，认为十七年来毛泽东思想的光辉同样照耀在教育战线上，成绩是主要的，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只是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广大的干部是好的或比较好的。这就是“红线主导”论的主要论点。

在这场大辩论中，双方引经据典，调查分析，力图证明只有自己的论断才是真正符合毛泽东思想的。

在当时的辩论中，抓住有利于自己的毛主席语录，片面的做有利于自己的理解，把对方的观点推到错误的极端，这些都是常用的手法。譬如纵队派认为“彻底砸烂”论就是要否定十七年共产党领导的伟大成绩，就是为被打倒的阶级敌人翻案，所以把团派说成是极“左”派。而团派则认为纵队派是包庇刘少奇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路线，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把纵队派说成是机会主义的右派。双方都不怎么关注、不实事求是地承认对方的论点中包含着合理的正确的成分。

我在整风与反唐、反“八八”这件事上，已经与总部不唱一个调子了。在干部问题上，虽然我自己也比较迟钝，但我对总部更迟钝的反应感到不满，对《罪责难逃》大字报的出笼非常反感。我认为纵队派在干部问题是紧跟中央的战略部署，做得比总部好多了。

这期间，我写过不少大字报。我坚决拥护《红旗》调查员的文章，支持纵队派在干部问题

上的观点，批评总部在干部问题上表现迟缓、行动不力。但是，我对刘冰这样的校党委主要负责人的表态也表示出高度的警觉。我曾发表声明，认为“刘冰亮相是反扑”[4—P142]。我对解放干部的认识只限定在清华的基层、中层干部。像刘冰这样清华党委的第二号人物，我认为应该是属于修正主义教育黑线上的代表人物，是走资派，属于打倒之列，根本谈不上什么解放。

在关于干部问题的辩论中，“天安门纵队”逐渐成了“三纵队”的同盟军，很自然地融合进纵队派的阵营里。我也常常成了“三纵队”头头们聚会的座上客，与他们打得火热。

与“三纵队”的关系热，必然地，与蒯派的关系就凉。

第十一节 《多数赞》无人喝彩，《少数赞》时过境迁受批判

蒯派掌权以后，不少人向我提建议：老孙，我们现在已经变成多数派了，再写一篇“多数赞”赞一赞吧。

在我写《少数赞》的时候有一股难以抑制的激情和冲动。但是此时，我并没有写“多数赞”的一点点念头。因为在总部里都有好几个人鼓动我写，老蒯也曾对我提议过，我盛情难却，只好硬着头皮写了一篇《革命多数赞》，算是《革命少数赞》的姐妹篇，贴出去了。

后来，《井冈山报》以“第一湘江”的名义将此文更名为《革命少数掌权赞》，刊登于1967年3月24日的第四版。这一天，正好是“井冈山红卫兵”成立半周年纪念日。这一期中，第一版发表了蒯大富的《井冈山人永远忠于毛主席——庆祝“井冈山红卫兵”成立半周年》，我的这篇文章与“冲霄汉”的《井冈山人赞》一起发表于第四版。

文章虽然不长，完全引录没多大必要，摘录几小段如下：

地位改变了！显赫十七年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蒋南翔被拉下了马，永世也不得翻身！

地位改变了！王光美、薄一波、王任重等大小政治扒手不过是清华政治舞台上匆匆过往的政治小丑，一个个地被揪了出来，现出保皇的丑恶原形！

地位改变了！那些被蒋南翔视为“个别捣蛋”“不好摆布”，被工作组打成“反革命”“蒯氏人物”的革命小将掌权了！他们发号施令，“俨然”是清华园的主人！

.....

历史把一切都记得清清楚楚：

是谁，识破校党委种种阴谋诡计，高举“反蒋”的大旗，把斗争的锋芒直指蒋南翔为首的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是谁，在王光美的法西斯统治下，负着种种反革命的罪名，用鲜血抒发对毛主席最深厚的革命豪情？

是谁，蔑视修字号的清华大学红卫兵的白色恐怖，独树井冈山旗帜，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了最致命的攻击？

又是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以“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英雄气概，揪出了中国修正主义的总根子刘少奇？

正是革命小将！

.....

他们从少数转化为多数！

他们从否定得到了肯定！

他们从无权变成了有权！

地位改变了。但是，革命小将们：

他们分得清社会上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坚定不移地站在毛主席这边，向刘邓黑司令部发起一次又一次毁灭性的打击！

他们分得清头脑中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坚决夺“私”权，让“公”字对“私”字实现无产阶级专政！

他们砸烂了旧制度，正在建立革命新秩序！

他们参加着埋葬帝国主义的战斗，同时又在用最美丽的图案来描绘共产主义光辉夺目的图景！

.....

让那些以不犯错误为荣的庸夫俗子去自豪，去自鸣清高吧！

让阶级敌人去咆哮，去狂跳，去发抖吧！

有毛泽东思想太阳般的光辉——塌不了天！

有千百万真心实意拥护革命的群众——陷不了地！

这些用毛泽东思想哺育成长壮大的革命小将，井冈山人——新的无产阶级当权派，像矫健的海燕，迎着暴风雨的洗礼，朝着东方的旭日展翅高飞，前程无量！

这篇赞扬少数派掌权的文章有点类似于当今社会常见的庆祝××周年纪念歌功颂德的应景文字一样，没多少新意，通篇是大话空话还有气壮如牛的豪言壮语。记得原稿里还说了几句掌权的少数派更要团结大多数，更要把握斗争的大方向，更要严格要求自己，真正为革命而掌好权、用好权之类的议论。这是我这篇文章中因为对蒯大富对“井冈山”的忧虑而最想说的话，很遗憾，在发表的时候被删除了。

对于蒯派而言，在落难的时候，《革命少数赞》是雪中送炭，是情绪低落情感脆弱时的互相慰藉；现在蒯派翻身了，《革命少数掌权赞》只不过是锦上添花，是众多庆贺声中的一次鼓掌。地位不同了，感受也完全不一样。所以，这篇大字报贴出后，基本上是无人问津，无人叫好，很快就被淹没在新的新大字报中也就不奇怪了。

这些掌了权的蒯派们，心中更愿意听到对往日与工作组斗争英勇业绩的讴歌赞扬，对红色“井冈山”的倾力支持，而不是逆耳的告诫和不入调的提醒。

在总部里，我不敢说自己是头脑最清醒的总部委员，但我敢说，我是最不敢自夸最革命的总部委员。可能是我一直对自己政治上的不自信，所以我比别人要更多检点自己的言行。我在文章里提出了要夺取自己脑子中“私”字的权，提出革命小将以后还会犯错误。因为，我那个时候已经隐隐约约地感觉到，我与蒯大富之间在观念上的差距越来越大。我曾对王允方谈起过，在政治勇气、政治智慧、政治嗅觉、政治手腕等方面，我比蒯大富差得太多。而在思想观念和道德修养方面，我说我感觉蒯大富“根基比较浅”、“基本功不扎实”。我当时没敢说“修养不够”。因为“修养”一词已经被批成修正主义的货色，是个贬义词了。

我与老蒯离心离德的言行，我与总部或明或暗的唱反调，理所当然地引起了部分团派群众对我的不满。

很有意思的是，在蒯派被工作组迫害受压的时候，我因为那篇《少数赞》被他们引以为知音。而当我成了总部里的持不同政见者，并且与“三纵队”搅和在一起的时候，这些昔日的战友对我已经有点无法忍受了。

1967年三四月份，作为批判刘少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部分，刘少奇的名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也被大张旗鼓地批判。

在群众揭批“黑”《修养》的时候，我的《少数赞》也被“联系实际”，捎带着批了一把。

在《少数赞》中，有这样的一些文字：“当他处于少数时，也可能是他的个人杂念会猛抬头的时候。什么委屈、误会呀，什么打击、帽子啊，什么前途、命运啊，……都会冒出来。他必须不疲倦地进行自我革命。当他发现自己少数观点是错误时，勇于向真理低头，修正错误，而决不能固执己见，或羞羞答答。不敢认错，更不能文过饰非！”

有个战斗组就批判上了：这腔调完全是刘少奇的修养嘛，一个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在战斗的时候怎么还会有那么多的私心杂念呢？

有的大字报据此断言：孙怒涛本来就是一个深受刘少奇黑《修养》毒害的修正主义苗子，是个典型的修养派！

那时，我的心理素质已经很能承受大字报点名批判的“礼遇”了。对这些，我认为都不值得理睬，所以就一笑了之。

想当年，我与班上的许多同学一样，在学《毛选》的时候，这本《修养》也是当做与“老三篇”⁵⁷一样的经典著作，研读了多遍的。我并没有去学习后来被批判的“吃小亏占大便宜”之类的市侩哲学，也没有看出“阶级斗争熄灭论”的修正主义货色，而是秉着革命者应该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的目的去学习去研读的。《修养》给我最深的影响就是要做党的驯服工具。所以，这些批评者认为我深受刘少奇“黑”《修养》的毒害，这话虽然不中听，倒也是基本不错、入木三分的。

绝大多数团派群众，总部的大多数委员，尽管与我在看法上有分歧，观点上有争论，但是彼此相处，态度依然还是比较友善的，并没有把我当做另一个唐伟。

不过，也曾经发生过很尖锐的冲突。

3月10日，“在大礼堂召开整风大会，对总部组织路线进行整风。孙怒涛发言，提出要罢刘泉、陈育延、张云辉、邵凯胜的官。”

总共才二十人左右的总部委员，我为什么要一口气同时罢免四个？我现在已经想不起具体的原因了。依稀记得要罢刘泉、陈育延的官，主要是因为他们都是“八八”的头头，却带头反“八八”，我对他们的这一做法很反感。至于张云辉和邵凯胜，我并没有与他们有任何不愉快的过节，仅仅是因为他们与蒯大富关系密切，他们在总部里的作用不大，蒯大富拉他们入总部，有任人唯亲的嫌疑。

如果我只提议罢陈育延或刘泉一个人的官，说明我多少还有一丁点儿政治头脑和斗争策略。可是我提出要罢免四名总部委员的官，这是不是太过分了、太没有道理了、太愚蠢了？我是成心在给自己树敌，成为众矢之的，最后一个都没罢免成。现在回过头来想想那时候的我，头脑的简单、思想的幼稚、行为的孟浪，简直可笑之极！

对我的罢官动议，其他的几位当事人没有回应。只有陈育延，这个敢说敢做性格爽直的人，她毫不示弱地马上对我进行反击。她“贴出大字报《井冈山兵团内部在酝酿着修正主义复辟》，认为总部右倾，有资本主义复辟逆流，认为应将孙怒涛轰出总部。”

正当我们俩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还是“28团”著名的战斗组“打落水狗”、“冲霄汉”等说了几句公道话。他们认为“孙怒涛在敌人反扑时提出罢陈育延、刘泉、张云辉、邵凯胜四个革命小将的官，是书生气十足的表现，我们不同意，但也不同意把孙怒涛拉下马！”

蒯大富在这一事件中表现得很宽容，也显得比较公正。他既没有批评谁也没有指责谁，既没罢谁的官也没把谁轰出总部，悄无声息地平息了这出由我引发的总部内讧。

□ 摘自《良知的拷问》（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3年2月第一版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